

称谓语境阐释下的宋朝对外交往关系

南京师范大学 冒志祥

摘要 宋朝对外交往文书中的称谓体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形式。称谓的复杂性,体现了宋朝对外关系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既体现了历史的继承性,是传统“天朝礼治外交体系”的延续,又是宋朝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对以朝贡形式维持的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的颠覆和瓦解。

关键词 称谓语境 文书 宋朝 外交关系

中国自汉唐以来,逐渐形成了在华夷思想指导下的所谓“天朝礼治外交体系”,建立了以朝贡形式维持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所谓的世界秩序,“运用男女有别、老少有分、贵贱有差的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体系,坚持了男对女、老对少、上对下、贵对贱的统属关系,亦即强调后者对前者的附属关系”^[1],由此构成的“礼治主义”、“礼治体系”以及“礼治的世界”,在各个方面被体现出来。反映在所谓的“世界秩序”上,强调小国对大国、弱小政权对强大政权的“以小事大,事大以诚”,具体到方向的选择、数字的运用、颜色图案的选用及文书、文字的表达等都有明显而严格的要求。就文书而言,小到用字、称谓甚至标点,大到文书内容等都体现出严格的等级。

宋政权的建立,使得自久远建立起来的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被逐步瓦解。在北方,与宋朝并存的辽、金、西夏等,不仅使得宋朝“没有能力强行推行中国的世界秩序”,“而且也无法阻止像高丽这样传统的附庸国向辽、金等‘蛮夷政权’输诚”^[2],这种新的所谓的“世界秩序”,在外交盟誓文书、国书等文书中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而作为文书组成部分的称谓,则从语境的角度阐释了宋朝的这种对外关系。

—

外交文书中的称谓,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什么人(或机构)对什么人(或机构),即行文者与收文者之间“允许”构成的关系,这种“允许”就是所谓的“世界秩序”。如北宋,开始时多是以宋国主的名义对金国主行文,但宋、金关系的变化,宋国主只能对金皇子或大元帅行文。也就是说,宋国主的地位被降低,身份被改变;二是形成的关系不是以人际现实为基础,而是以双方或多方的“人为约定”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称谓与年龄等事实并无必然的关系,一个政权的年老皇帝对另一个政权的小皇帝可能一样必须称“叔”、“伯”、“爹”甚至是“爷”。这是外交文书称谓有别于私文书的显著特征。

综观宋朝对外交往文书,在称谓形成的关系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以国家政权名称谓来表示。按照外交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往来的盟誓文书与各种国书等应该以国名称谓才是最妥当的。宋朝文书,无论是宋辽还是宋金、宋夏等,往来文书都有使用这种称谓的。如“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一般说来,盟誓文书的称谓基本使用国家名称,如《南宋誓书》和《回赐誓书》就是典型的证明^[3]。但国书在这种称谓的处置上会发生变化。当宋、金政权关系发生变化时,称谓就变化为:“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皇子郎君”、“大宋皇帝致问大金皇帝皇子郎君”等,尽管这里去掉了常用的“谨”字,或把“致书”改为“致问”,但这种一国皇帝对另一国皇

子发送国书的变化,其蕴涵的信息是值得认真分析的。

二是关于以亲属称谓来表示的。从外交文书所确立的亲属关系来看,有兄弟关系、有侄叔(伯)关系。如“兄大宋皇帝致弟大契丹皇帝”,“侄宋皇帝致书于叔大金皇帝”,“侄宋皇帝致书于伯大金皇帝”。也有父(爷)子(孙)关系,如“男邦尼鼎定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三是关于国名称谓中加入“大”字。体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都在国名前加“大”字,这是唯我独尊传统思想的体现,是皇权的体现,是集权制思想的体现。另一种是只在一方国名前加“大”字,多是在本国名前加“大”字,而在另一国国名前不加“大”字,但也有与此相反的。这是往来国之间平等关系被打破,一国意志被强加给另一国的体现。

四是在皇帝后加“名字”或“谥号”等,这在盟誓文书和国书中是特别重要的。早在北宋初期,北宋与南唐的关系中,南唐皇帝李后主曾经专门两次派使者,一次是恳请宋把对南唐的国书改为诏书,还有一次是恳请宋皇帝对南唐皇帝不要称“国主”,改为呼其名^[4]。看来,呼名称谓在文书中是有特殊意义的。在南宋对金作出“世为侄国”的承诺后,宋皇帝给金国皇帝的誓书和国书的称谓就变为诸如“侄宋皇帝”,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这里,宋皇帝的名字不必回避,因为它是“侄”,是晚辈,但对叔(伯)皇帝只能用尊号而不能出现名字,同时,自己要谦虚地表示“谨再拜”,对叔皇帝还要加尊称“阙下”。而金国回给南宋的国书,“叔大金皇帝”不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只写为:“叔(伯)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总的来说,当国书中出现行文者的名字的时候,行文者的地位比没有名字的行文者地位又大大降低。

二

从宋朝对外交往文书称谓的用法来看,宋朝对外交往构成四个具有本质差异的层次。

1. 关于宋、辽关系。早期的宋、辽盟誓及国书只称国名。自宋与辽(契丹)确定为兄弟之国始,宋盟誓文书和国书致契丹国主者,称“兄大宋皇帝致弟大契丹皇帝”,致契丹嗣主者,称“伯大宋皇帝致书侄大契丹皇帝”,致契丹皇太后,称“侄大宋皇帝谨致于婶大契丹国皇太后”。宋辽外交的实际也基本上是以平等与和平为主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现代外交特征与外交原则来讲,平等与和平应该是外交的主旋律,而从历史来看,所谓的宋辽平等外交关系却打破了由汉唐形成的东亚外交圈的基本格局,是对汉唐礼治外交体系的破坏和颠覆,而由汉唐形成的东亚外交圈和天朝礼治外交思想,在宋以后的列朝统治者都试图加以恢复,应该说,新型外交体系的确立和对传统外交体系的破坏和颠覆,是宋朝国力下降,军事实力削弱的

表现,从整个外交历史来看,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但这种大致平等的外交关系,又使得宋朝处在一个以和平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下,从而促进了宋朝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大发展。

2. 关于宋、金关系。宋、金关系表现在文书称谓上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宋、金海上之盟开始的一段时间,宋金外交文书维持了较为平等的外交关系,誓书和国书基本上称“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后来在宋、金外交关系中,大宋皇帝变誓渝盟,被金抓住把柄,授人以口实,宋、金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国书变为“大宋皇帝致于大金皇子郎君”或“大宋皇帝致于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等类似的称谓,再后来,宋、金文书称谓变为“侄宋皇帝致书于叔大金皇帝”、“侄宋皇帝致书于伯大金皇帝”等。从宋、金盟誓文书和国书称谓的变化,我们大致可以管窥北宋末年到南宋外交变化的轨迹:从“相对平等的关系”到宋朝外交规格的降等、降级再到后来的臣君关系、侄伯(叔)关系。即使是侄叔关系和侄伯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称谓的变化,而是“国家关系”的变化。

3. 关于宋与西夏关系。尽管宋与西夏发生过多次战争,宋和西夏的关系也常常是貌合神离,但总体上说,西夏一直是宋的臣属国,宋是君,西夏是臣。在文书中的称呼常常表现为君臣关系或父子关系。当然,西夏在文书称谓的选用上也一直在与宋进行着较量。

如:癸巳,延州言元昊遣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勛来纳款。……从勛持元昊书至保安军,其书自称“男邦尼鼎定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从勛因请诣阙(庞) 籍以为父子关系) 名体未正……从勛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使从勛至京而天子不许,请归更议之。”

4. 关于宋与高丽关系。宋朝与高丽关系存续期间,北宋与高丽绝大部分时间以君臣相称。宋徽宗为了实现其收复燕云之地的梦想,曾经给高丽王密诏,按宋与辽的关系确定宋与高丽为兄弟之国。南宋以后,由于金的阻隔和宋朝外交上的保守,宋朝与高丽的官方关系一直比较冷淡。

三

称谓对外交文本及其体现出来的国家关系、外交政策、外交理念、外交地位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它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传导着外交工作中的许多信息。

1. 称谓的确立强烈地体现着外交工作中形成并需各国相互遵守的“国家关系”。外交文书中称谓所体现的“国家关系”非常丰富而具体,有时是平等的兄弟之国,有时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关系,有时是由等级关系派生出来的长辈与晚辈的辈分关系。请看以下文字:

上与大臣议,良弼奏曰:“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奉表为书,恩赐亦已多矣。今又乞免亲接国书,是无厌也,必不可从。”……遂从良弼议,答其书^①。

又如:宋遣试礼部尚书魏杞,崇信军、承宣使康涓,充通问国信使,取到宋主国书式,并国书副本,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为二十万两、匹,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涓入见,其书曰:“侄宋皇帝稽首,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魏杞还,复书“叔大金皇帝”不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和好已定,罢兵,诏天下。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太子詹事杨伯雄副之^②。

再如:五年正月辛亥朔,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诏泰州、临潢

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己未,宋通问使魏杞等以国书来。书不称“大”,称“侄宋皇帝”,称名,“再拜奉书于叔大金皇帝”。岁币二十万。辛未,诏中外^③。

这三段文字,首先确立了南宋王朝与金国构成的关系:南宋是臣,金国是君,臣与君有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其次,南宋与金国构成的君臣关系,在外交文书上体现为长辈与晚辈的亲属关系,但这种亲属关系又不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是叔侄的关系(后来又变化为伯侄关系)。仔细加以分析,作为君臣之国,不管称谓如何变化,其本质是不可逆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南宋与金国之间形成的不容更改的基本外交格局,一切变通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外交关系。但是,历史上的君臣之国,其体现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父子关系、叔(伯)侄关系等。其中,父皇帝与儿皇帝的关系不在少数。在五代,类似的儿皇帝就有好几位。如后晋石敬瑭。据史料记载:“(天福元年,936),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鹰门,与唐兵战,敬瑭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两年后,契丹人册封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耶律德宗(辽太宗)也曾对后汉高祖刘知远“呼之为儿,赐以木拐”。当然,南宋的实力及版图远大于后晋和后汉,也许是南宋这样的大国与其悠久的历史,也许是为了顾及南宋的面面,也许是金国的势力虽超过辽国但还是不能使宋帝成为刘豫、张邦昌那样的“儿皇帝”,金国并没有以君臣之称谓或父子之称谓来要求南宋,而只是“许宋世为侄国”、“侄宋皇帝”,也就是在形式上变化为叔侄关系,当然,这种叔侄关系不是年龄上的叔侄关系,与宋辽文书中盟誓文书出现的“侄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婶大契丹国皇太后”不同,宋辽文书中的“侄”,确是大宋与辽在兄弟之国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侄甥关系”;而宋金文书中的“侄”,是等级上的叔侄关系,南宋是“世为侄国”,也即这时的外交文书称谓是不用考虑年龄及真实关系的,南宋皇帝再老,金皇帝再年轻,也是“侄宋皇帝致书于叔(伯)大金皇帝”。这与北宋早期与辽国形成的兄弟、甥侄关系有天壤之别。

2. 称谓的确立是各国国力在外交工作中的综合体现。毫无疑问,要实现外交工作中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必须有自己良好的外交信誉,有强大的国力,有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从这一层面看,作为外交工作具体体现的外交文书,其称谓是与自己的国力密切相关的。宋朝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就说:“今四夷请和,使者入谒,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既要“以礼乐”接待,但“示以兵威”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各国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具有绝对的优势,才能确保外交工作的平等开展,当然也包括外交文书中争取到平等而合理的称谓。

3. 称谓的确立也体现了“国家”的外交思想、外交理念和外交思路。各朝政权在外交文书的称谓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每一次称谓的变动,无不体现着本朝的外交目的、外交思想、外交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在各个朝代都有所体现。如唐太宗在与颉利等经过多年的交战以后,稳定了北方,于是接受了“天可汗”的称谓。作为中原地区的大国皇帝,唐太宗并没有使用中原地区的封号,而是使用了具有北方民族的封号“天可汗”,这是为什么呢?《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的记载是:

解读清太祖圣训中的“公”

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王东峰

摘要 “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圣训中的核心内容,其内涵是公正、公平,文章通过对“公”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及对公民进行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清太祖圣训 “公” 和谐社会 爱岗敬业 借鉴意义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林林总总的清代文化宝库中,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清史稿》等鸿篇巨制,而对于历朝皇帝的“圣训”则重视不够。实际上,由清代历朝史官纂修的皇帝的训政言论,内容丰富,涉及政治举措、用人行政、社会现状、中外交往、民族关系,乃至帝王婚丧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诸帝的施政特色与治国风格,从而收到鉴古知今的效果。

《清太祖圣训》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训政言论,仅有4卷,是《大清十朝圣训》(自太祖至穆宗同治)中内容最少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公”的重视与推崇。现就圣训中有关“公”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如下:

1.“至公”。卷一《敬天》,(天命六年)四月壬申。上谕诸贝勒曰:“国君与贝勒听断国事,皆知以至公为贵……惟能处以至公,绝无私念,乃为天所佑”(《大清十朝圣训》第一册第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下文仅标注引文的具体页码)。卷二《训诸王》,(天命六年辛酉四月壬申。上谕诸贝勒曰:“……凡人处世之道,以公为贵,与其皇皇求利,不若求此至公之心。……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克勤于国,俾其安辑,则天锡丕基能永享矣。……朕听国家之事,是非臧否,准以

至公,未有溺嗜好、徇货利而妄断者”(第17页)。又,“七月庚子。上谕诸贝勒曰:‘……朕以至公养人,无所偏向’(第18页)。

2.“公诚”。卷二《论治道》,(天命元年丙辰正月癸酉。上谕贝勒诸臣曰:‘……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诚,而去其私也。……抚有大国者,能以公诚存心,建立纲纪,教养兼施,则天地神祇,必交相感应,而群方亦莫不爱戴,以之均平邦国,臻于帝王之道无难矣’(第15页)。《训群臣》,(乙卯五月庚戌。上谕侍臣曰:‘治国家者,尚宽大,秉公诚,乃能传世久远,基业牢固’(第19页)。又,“天命三年戊午润四月壬午。上谕侍臣曰:‘……故自上至下,有立志公诚者,谓之积善,善既积,有不致福者乎?居心邪慝而横行暴虐者,谓之积恶,恶既积,有不受祸者乎?……自朝廷百官以及万民,虽贵贱不同,然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何也?天命之为君,不能修天大业、行善事,以顺天意而合人心,乃溺志卑下,即于愆淫,天必遣之,基业废堕矣。君命之为臣,不能惮忠勤,恪恭厥职,而邪僻存心,忽怠从事,君必罪之,身亦不保矣。至庶民,行一不善之事,则刑戮随之,所谓凡人之祸,皆由自致也’(第20页)。卷三《求直言》,(癸丑正月。上谕众大臣贝勒曰:‘为国之道,存心贵乎公,谋事贵乎诚,立法布令,则贵乎严’(第27页)。

3.“公忠”。卷二《训群臣》,(天命六年七月)甲寅。上谕侍臣(1162年),宋人议和,朝廷已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但不肯世称侄国。往复凡七书,然后定。^[1]这是南宋抓住的唯一一次改变自己外交被动局面的机会。宋与金反复交涉、较量,最终将“表”改变为“国书”,将称谓由“臣”改为“侄”,这种变化,意味着宋、金“国家关系”已经向平等关系迈出了一大步。

由此看来,外交文书称谓的使用,不是简单的相互关系的表现,而是各朝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是“国家”政治、文化、外交等的综合性反映。

参考文献:

- [1]黄连枝.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M].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91.
- [2]莫里斯·罗沙比.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及其邻国[M].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7.
- [3][金]佚名.大金弔伐录[M].1版.中华书局,2001.
- [4][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M].1版.中华书局,1977.
- [5][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五[M].5版.中华书局,1986.
- [6][元]脱脱,等.金史:卷八十八[M].1版.中华书局,1975.
- [7][元]脱脱,等.金史:卷八十七[M].1版.中华书局,1975.
- [8][元]脱脱,等.金史:卷六[M].1版.中华书局,1975.
- [9][宋]欧阳修,宋祁.张说传.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M].1版.中华书局,1975.
- [10][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五[M].1版.中华书局,1977.
- [11][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七[M].1版.中华书局,1975.
- [12][元]脱脱,等.金史:卷八十四[M].1版.中华书局,1975.

作者:冒志祥,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者邮箱:maozhixiang@126.com

(责编:赵芷仪 zm)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这里,关于称谓的史实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在对外交往文书中称谓的严谨性。只有唐朝天子可称“天可汗”;二是称谓本身体现了唐朝的对外交往思想和对外交往策略。它反映了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决策集团,在处理唐与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关系上,采取淡化种族,努力实现民族融合的思想。

称谓的变化,带来的是外交关系的变化。宋朝使者魏杞在出使金国时,金人胁迫魏杞去掉文书中“大宋”的“大”字,魏杞据理力争,断然拒绝,强调“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和则两国享其福,战则将士蒙其利,昔人论之甚悉。”最终使得金国“损岁币五万,不发归正人北还”,并“正敌国礼”^[4]。所谓“正敌国礼”,就是保持双方平等外交关系,可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外交胜利。

称谓的变化,也可能成为外交斗争的策略。如西夏就曾经通过改变与辽国的关系,使得自己与辽国成为“甥舅”之国,再通过辽国去逼迫宋朝不要发动对西夏的战争,或在发动战争前事先通报辽国。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夏国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5],西夏借用这样的做法以金压宋,达到自己的目的。

称谓的变化,也是一个政权外交事务的准则。(金)大定二年